学术文化

# 圣保禄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李向玉

[摘要]澳门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创建于 1594 年,于 1762 年关闭,既是一所高等学校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大门。本文对这一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圣保禄学院 文化交流 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0)04-0077-06

**The Role of Saint Paul College in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Saint Paul College, which was founded in Macao in 1594 and closed in 1762, was both 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a bridge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It was also the "gate" through which the Jesuits entered China.

## 一

澳门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Paulo,俗称"三巴寺")创建于 1594 年,于 1762 年关闭,前后共 168 年的历史。拙文《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学内容及方法初探》(《澳门日报》),对这所具有影响的学校及其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其存在的 168 年间,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颇有作为的历史文化名人。它既是一所高等学校,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大门,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对澳门、对内地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历史、文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更大。确定它在澳门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的地位——远东传教士的摇篮、西学东渐的基地和欧洲中国学奠基者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但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我国明朝期间,欧洲发生了两件大事,即宗教改革运动和"新航路"的开辟,它们都直接促进了天主教向海外的传播。在宗教改革的巨大压力下产生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除了在欧洲与新教对抗外,还积极向远方传教。"新生的耶稣会第一个理念是宣扬福音。第四条誓言,即个人顺从教宗,不是强调教宗至上的权威

[收稿日期]2000—08—10
[作者简介]李向玉(1953—),男,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和耶稣会士的顺从精神，而是表达整体上可行的肯定性愿望以及愿意无条件地被派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宣扬神圣的法律。”①

“新航路”的开辟则为它们提供了向东方传播的可能性。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库特（Calicut）。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等地。1514年，葡萄牙船只出现于中国海岸。1553年，以晾晒及存贮货物为名入驻澳门，以此为据点，垄断了欧洲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便乘着贸易船只络绎东来。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92－1503在位）的通喻和1494年及1529年签订的合约，葡萄牙享有对东方的保教权，从欧洲经海路东来的传教士均要从里斯本出发，经果阿再到亚洲各地。十六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开始在叩打中国门户。

## 二

欧洲的耶稣会具有办学传统。耶稣会士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一边传教，一边兴办教育。1541年，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年）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以教皇保罗三世使者名义航海东来，于1542年抵达印度果阿之后开始传教活动，不久就创办了一所神学院，即“果阿圣保禄学院”（St. Paul's College, Goa）。耶稣会会士到达澳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教活动，于1571年在其住所旁创办了澳门第一所学校，1594年又将其升格为大学，一直到1762年关闭，这就是圣保禄学院。

圣保禄学院的创建及其发展历史是与十六至十八世纪（明清间）基督教在华进行的第三次传播史相始终的。它的教学及其他活动或兴或衰，一直伴随着基督教在华的历史脉搏而起伏跳动。中国教会史学者主流意见认为：“耶稣会是由殖民列强、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派往中国进行传教，推销精神鸦片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在华的主要活动是布教和力图使中国受归化。但是，他们在中国也从事许多文化方面的工作……”②笔者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耶稣会在澳门创办圣保禄学院的宗旨，正是为了在远东传教，并使中国归化。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开展了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这对中西文化交流，对培养修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圣保禄学院办学基地虽然在澳门，但是它的活动范围不只是澳门，而是整个中国以及远东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却成了它活动的主要历史舞台，幅射的范围不断地扩张到交趾支那、暹罗和柬埔塞等国家。

圣保禄学院肩负着在中国及远东传教的任务。我们知道，在中国传教团建立的早期，圣保禄学院的院长就负责监督中国教区的活动。1596年1月16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载：“在本院所辖及支持的范围内还有中国传教团”。由此可见，该院除教学外，还一度担负指导中国传教团的使命，它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教务亦有影响。每当视察员范礼安决定开辟一个新教区时，均从这所学校挑选耶稣会士进入新区工作。范礼安1606年病死于澳门圣保禄学院。这位圣保禄学院的缔造者，对于该校的建立与发展是倾尽了全部心血的，直到临终时刻，他仍关心这所学校及其培养的学生。1604年1月27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录了他患病后，在学院与学生的谈话时，仍策划安排了七名神父、修士前往中国、日本从事传教的工作。年报这样写道：“范礼安神父在病中，担心自己的病情会恶化，预先委任将赴日本和中国的神父。结果，他委任了十二名神父去日本……”④1615年1月2日及1616年1月27日的葡文年报记载了 Nicolao da Costa 神父在澳门签署的一份文件，文件中写道交趾支那教区（现越南）要求并欢迎圣保禄学院派遣神职人员去那里工作，并建立教团。

历史告诉我们，圣保禄学院是耶稣会培养远东传教士的摇篮。它不仅培养了澳门当地所需的神父，而且培养了赴远东，如日本、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国传教的大部分神职人员。在它存在的近二百年的历史中，据澳门葡萄牙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父著《澳门及其教区》第363页载，1552年至1762年曾于所属葡萄牙保教区——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录中，经圣保禄学院入华的人数就有163名。圣保禄学院作为耶

稣会培养远东传教士的高等学府，这一地位与使命是学院常常自我标榜的。如 1596 年 1 月 16 日的年报说："日本的会长可满意地拥有在本院培养的毕业生。学校将他们派往日本或派往中国，无需其人民负担什么，所以也没有任何怨言……"⑤同时也得到当地中国政府认可，康熙帝就曾命西洋教士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入华。康熙四十九年(1710)命赵昌等传旨给在京的洋教士，云："新来之人，若叫他来，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著尔等作通事，他心里也不服。朕意且教他在澳门学习中国话语。"⑥如果说康熙帝谕旨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圣保禄学院的教学中国语文的地位，那么作为 1744 年(乾隆九年)被选派为第一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及其继任者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对三巴寺及其僧人世习其业的肯定记述，甚至多有赞美之词，就决非偶然。印光任、张汝霖均为朝廷命官，在任澳门同知期间搜集资料撰写了《澳门记略》，最终完成了这一传世之作，为研究早期澳门历史和中西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其中对三巴寺的记录实系权威性意见。从该书的资料准备到其初稿由印光任于 1745 年(乾隆十年)在澳门同知任内写成，仍为圣保禄学院开办期间，因此是当时历史见证者的记录。

澳门历史学者王文达先生在其所著《澳门掌故》中有"大三巴牌坊详考"一节，具体阐述了中国政府赋予学院的崇高地位："在圣保禄教堂门前之石阶上，其左右两旁，原来竖立围杆一对，与中国之衙署或祠堂庙宇门前所竖立者无异，据中国旧日规例，要有高官显爵，才准许在门前建竖围杆，以炫耀其功禄。今圣保禄教堂亦然，因当时耶稣会之神甫，及其修院之毕业生等，多曾受到明清朝廷封官，到北京任钦天监之职，按照例规，圣保禄教堂门前，亦得竖立围杆也。"⑦的确如此，从圣保禄学院毕业的修士入华之后，大都成了传教骨干。其中不少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著书立说，出版众多研究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者。他们中还有一些人进入北京宫廷，按照学历获授适当官职，如汤若望被顺治皇帝任命为清政府钦天监监正。1651 年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官衔是太常寺卿。1653 年赐他"通玄教师"封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归功于圣保禄学院的治校有方。圣保禄学院人才辈出，为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了一批批人才，称其为"摇篮"恰如其分。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表明，澳门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西交流的桥梁。在 1575 年，澳门就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第一个主教区，负责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工作。同时传教士把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他们又都是饱学之士，或精通音乐、美术、天文学，他们以介绍西方科技文化为手段进行传教，把西方科技文化传到中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于 1993 年 2 月 19 日为陈炎教授专著未刊稿《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数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随着澳门回归祖国，对于澳门史的研究也日益深入。许多学者近年纷纷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澳门在中西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澳门教育概论》在谈到圣保禄学院在澳门教育发展史中的历史贡献时认为，该院培养了一批西方汉学家，使欧洲出现了第一次"中国汉学"热，指出"圣保禄学院的创办是澳门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澳门以及中国近代化特别是教育近代化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圣保禄学院不仅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培养了西方许多汉学家，而且使许多传教士顺利进入中国，对中国诸多领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约计有近 200 人，分布在中国各个区域，在传教之中也传授西方科学技术。这些学者还把大量的中国典籍，如四书五经等翻译介绍到西方，并著书立说，研究中国，形成一支研究汉学的队伍，出现了欧洲第一次'中国汉学'热。"⑧该书还对传教士的著作做了统计：从 1552 年到 1687 年间共有著作 644 种，其中研究介绍中国的 69 种，占 10.9%，内容有综合报导、礼仪问题、历史、天文地理、宗教哲学、自然科学、译书等。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而当时作为耶稣会在远东基地的圣保禄学院则担负着这场运动的指挥机关的作用。我们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可以以事实为证：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 1578 年抵达澳门，在潜心研究中国国情、典章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后，悟出一个道理，即耶稣教会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比教会更悠久的文明古国，单纯的传教并不能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意识形态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以儒、道、佛多元思想为架构的；也改变不了中国民俗民风，必须选择有才能的教士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深入社会各阶层，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并从介绍西方的科技入手，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他每次来澳门都住在圣保禄学院，并在此召见远东区的传教士，听取他们的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同时，根据范礼安的安排，澳门圣保禄学院还负责监督中国传教区的工作。圣保禄学院作为耶稣会在远东的基地，还担负着驿站的责任，负责传递信息。除了在远东各个传教团之间沟通、联络外，还不断地将这一地区的情况以报告的形式向罗马总部汇报。今天在里斯本、埃武腊市收藏的一期期《圣保禄学院年报》以及大量的耶稣会会士的信函即为明证。作为驿站，圣保禄学院还将耶稣会会士翻译的中国典籍传送至欧洲出版，如 1593 年，利玛窦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并委托圣保禄学院寄回本国出版。艾儒略在《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这样写道："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为中邦经书，其能认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利子之力也。"利玛窦译《四书》正值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语，刊于杭州。马若瑟自雍正十一年(1733)后，留居澳门，研究中文，潜心著述，所著《经传义论》，是六书、《五经》、《四书》、诸子、宋学之导论，抄本今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圣保禄学院开办近二百年间，汇集大批欧洲学者、科学家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统计出他们在澳门翻译了多少中国典籍，但是我们翻查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一十八世纪)时，吃惊地发现仅这一图书馆所藏由教士们撰写的中文著作就有 487 本，其作者为明清这一时期的著名传教士，主要有利玛窦、艾儒略、毕类思、白鲁、郭居静、柏应理、龙华民、罗日藻、魏框图、毕方济、邓玉函、金尼阁、熊三拔、南怀仁、徐光启、杨廷均等。这些著作的内容极为广泛，除了天文学，还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总之，圣保禄学院作为耶稣会的驿站，为之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圣保禄学院除了是东方传教士的摇篮，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基地外，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也很大。

## 三

圣保禄学院是耶稣会在远东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并且开设在中国的领土澳门，伴随着它的师生陆续入华，其影响所及遍布华夏各个角落，对教育影响尤深。曾在圣保禄学院任教二年的数学教师艾儒略，1613 年进入我内地后，不仅传教成绩卓越，而且宣传西方教育制度，包括以圣保禄学院为实例进行介绍。他在 1613 年发表的介绍西方教育的书籍《西学凡》中，就详细记载了欧洲大学的课程和制度。该书的问世和在内地的传播，使得我国教育界对于西方教育开始有了初步了解。

经澳门圣保禄学院传播进入中国内地的欧洲大学管理章程以及使用的教科书也为数不少，如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章程(Estatuto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其中介绍了该大学的神学课程、医学课程、数学课程和哲学课程。又如澳门圣保禄学院使用过的教材 Jardim Anagrāmatico e Divinas Flores Lusitaras, Hcspanholas, e Latinas 1654 年在里斯本印刷，现藏北京图书馆。可以想见，内地的教会大学或其他学校在办学时都可能借鉴或参考过这些资料。其他各种书籍，包括几何学和数学、地理学和地图学、西医学和西药学、天文学和历史学、物理学与工程物理学、建筑学与建筑术、音乐与戏剧等等，都源源不断地传入内地，渐渐被译成中文并为中国学校所采用。据钱存训[9]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

称，在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中，“至少有几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成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

明清之际，我国教育和学术界出现一股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教育思潮。这一思潮的重要社会背影就是以澳门为据点的西学东渐。梁启超先生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⑩他又说“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李凉庵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等都有趣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李、徐诸人影响不小。”⑪

诚如梁氏所指，自明末以来，伴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的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及其教育思想。于是，西学东渐与实学思潮相结合而兴起，二者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地形成此时中国科学技术、教育思想的大发展。以澳门为基地的西学东渐之时，适值澳门明清多事之秋，一些进步学者、有识之士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纷纷学习西学，致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教授，其代表人物有明末的徐光启、清初的梅文鼎等。徐光启首先提出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重视实践验证”的教育主张。这是他看到了西洋教育的优点，他说：“闻西古图有大学，师门生常数百千人。来学者先问能通此书（指《几何原本》），乃听入。何故？欲其心思细密而已。其门下所出名士极多。”⑫

要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才能出真才实学。这番认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可谓独树一帜，甚有见地。人们知道，中国传统教育侧重博闻强记，虽提倡多思，但更多的是从人伦道德上的领悟而言。徐光启抓住西方教育之胜于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更进一步指出，若要科学发达，就须重视人才的思维能力训练，高智低能，则无用于世。因此，使学生“心思缜密”，是学校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亦是能否出人才的关键一环。他的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很多教育家所接受，从而影响与宣传了近代的教育思想，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使中国近代的教育面目一新，“读西人之书，是由传统教育趋向近代教育的第一声呐喊，其教育内容和具体科目，皆有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直至梅文鼎继续徐光启会通中西文化的事业，新的科学知识才比较多地补充于传统教材之中。”⑬

圣保禄学院的课程专业设置，除了神学外，有数学、物理、天文历学、音乐等，不就是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初次实验并且获得成功吗？难怪《澳门记略》的作者写道：“三巴寺僧世习其业，待其学成，部牒行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督抚资遣入监。”正是由于圣保禄学院的毕业生们精通天文、历算诸学，才被召进京，协助朝廷修改历法，还获委任为“钦天监”的重要职位。

圣保禄学院采用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辩论”、“知识竞赛”、“猜谜”、“演戏”等，不都是今天澳门学校仍沿用的方法吗？记得澳门的一位史学家就曾评论说，如果要探研西方悲、喜剧传入中国史，恐怕首先要从圣保禄学院师生演译开始。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在明清之际是新颖的，明显使人感到，它不同于当时中国传统私塾所强调的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的方式；而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堂上鼓励学生提问、讨论，这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即先生讲，学生听，对经书解释，全照宋儒一套，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对我们当今的教学仍有借鉴之处。

虽然，我国的教育知识结构更新过程到了近代才算完成，但毕竟由澳门输入的西方文化知识已如阵阵清风吹醒了先进的中国人头脑，并为以后实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史料显示，在澳门曾有人试图复办圣保禄学院，但未能成功。可是澳门的教会却一直保持着兴办教育的传统，至今仍管理着澳门的大多数中小学。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耶稣会所崇尚的传播福音、注重教育的精神。

近年来，大家认识到，要研究澳门的历史，尤其是澳门的教育史，不能不研究耶稣会及耶稣会士在澳门和内地的活动，不能不研究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但是，圣保禄学

院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当初及后来一段时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因为它是一所耶稣会传教士开办的学校,过去人们对耶稣会传教士的负面方面的东西看得比较多,对它兴办教育、西学东传、中学西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识不够,因此,它的历史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带有某种偏见。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待它、分析它。作为历史,作为澳门史,尤其是澳门的教育史,应该有它的地位,应该写上一笔,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一所学校,它的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及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等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吸取其有益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圣保禄学院及其相关的历史。

---

①柯毅霖(意):《晚明基督论》,第 1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②荣振华(法):《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译者的话”,中华书局,1995 年。

③笔者译自 1596 年 1 月 16 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葡文),葡萄牙阿儒达宫所藏档案。

④笔者译自 1618 年 1 月 8 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葡文),葡萄牙阿儒达宫所藏档案。

⑤笔者译自 1604 年 1 月 27 日《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葡文),葡萄牙阿儒达宫所藏档案。

⑥《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五,陈垣定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

⑦王文远:《澳门掌故》第 96 页,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 年。

⑧冯增俊主编:《澳门教育概论》第 59 - 60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

⑨钱存训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的荣誉教授、远东图书馆荣誉馆长。

⑩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 页,东方出版社,1996 年。

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0—11 页,东方出版社,1996 年。

⑫《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义》卷二。

⑬黄启臣:《澳门通史》第 132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